

(← 上接第B2版)

1970年夏天第一次到罗庄看望姐姐时，老乡闻讯纷纷跑来围观知青的客人。他们看我的蒙古袍，试我的蒙古靴，评价我被风吹日晒染就的黑脸，热闹了好一阵子。如今我到罗庄插队，感到村民看我的眼光总带着审视和新鲜感，估计还有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我这个偏于自由野性的牧牛人在老乡异样的目光下开始腼腆收敛。

罗庄知青

锡林格勒大草原地广人稀，知青大多分散住到牧民家里放牧，难免有孤独感。知青初到罗庄时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然后自己打土坯，在老乡的帮助下建好知青点儿。知青住的窑坐北朝南，一溜十二间分成四套，每套一间堂屋加两侧的卧室。知青们不习惯睡北方农村的土炕，窑里一直支着简单的木板床。盖窑的钱来自国家发放的知青安置费。做床板和床凳的木头和窗扉上的玻璃还是知青从北京买了运到罗庄的。

山阴县安排了具有体育特长的知青到县城的一些工厂工作。我到罗庄插队时姐姐户口在罗庄，人在县大修厂做学徒工，兼县里中学的排球教练。我就用她留在罗庄的床铺，和储立新、张祖和同屋。姐姐不在身边，校友们都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减少了我初到时的很多困难。在寂寞的草原上我是独来独往的女强人；在罗庄，知青们的亲情柔化着我，我享受了被关爱的温馨。

夏天在牧区我们取用河泡子水，里面不乏牲畜的排泄物。冬天用雪水，在锅里化开后捞掉混杂的枯草马粪。现在在农区用上井水，至少刷牙洗脸有了洁净水，卫生条件好很多。

我们的堂屋里有个大水缸，洗漱用水要到水井去挑。储立新经常主动去挑水。看她大步流星地挑水走路我很佩服，也练习挑水。罗庄的水井不深，村民用扁担的钩子钩上铁桶，在井里晃荡打上水，再用扁担拉上地面。我第一次自己去打水，铁桶就脱钩掉进了水井，让我十分狼狈。我急忙跑回家求助，张祖和安慰我说这样的事他们初来时也经历过。她找了个老乡，三下五除二就把水桶捞了上来。以后我每次打水都格外小心，生怕水桶再掉到井里。

在内蒙家家都有装水的椭圆形大木水箱——台娄，运水都用牛车。现在挑水用扁担，压在后肩，把脖子上的筋都扯得生疼。路过的村民驻足微笑着看我担水，像看村里新来的戏班子。一旦有什么彩头，便是饭桌上的一道小菜。我忍着肩膀的疼痛，右手扶着扁担，左手甩开，让两端的水桶随着脚步颤悠着，尽量走得自然潇洒。既然有观众，这台步就不能走乱了，留下笑柄。

早上出工前大家在村里集合听队长分配任务，然后各自带上适用的农具到指定的地块劳动。我在罗庄没有任何农具，但是从来没有发愁过，苏燕燕和张祖和会给我找到农具。如果知青点儿没有，就去老乡家借。

一次苏燕燕去老乡家帮我借平头铁锹，一进院门就看到屋里女人在窗前向她焦急地摆手不让靠近。她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继续往里走，家里的男人拿着剪刀冲了出来，追着要剪她的裤脚。苏燕燕吓得飞跑回来，躲过一劫。当地的村民在家里有人坐月子的時候，会把布条系在院门的门框上，阻止外人进入。苏燕燕没有注意到标志冒犯了风俗，当家的跑出来剪裤脚是辟邪的补救方式。

牧区放牛靠的是骑马圈赶，男女体力的差距没有多大关系。农业劳动可是要凭力气，有些还需要技术。我们锄玉米，一垅地望不到尽头，一早到地边，锄一个来回就

到晌午了。我们和村民一起排成一大溜向前走，一人占一垅地，负责左右两垅苗。一窝玉米苗有两三棵，挤得很近，我们要在每一窝里保留一棵壮苗，锄掉其余的苗。除了间苗，还要保墒，把周围的土锄松。我的锄头下去没个准头，不是锄不到想要锄掉的苗，就是把一窝玉米连锅端。眼看大家跑到前面，我手忙脚乱跟不上，心里十分着急。

储立新和郑丽娜在我左右两个田垅锄地。她们把我夹在中间，顺手帮我把左右两边的玉米苗间好。我只要把垅间的土锄松，就跟着她们往前跑。锄到地头，可以望见桑干河了，那些干得快的壮劳力早已坐在地头抽了一袋烟。我们没有停歇的时间，就又跟着他们换了田垅往回跑。一天下来腰酸臂痛，体会到了农业劳动的强度和自己的笨拙。除了知青，参加锄地的农民里没有妇女。我真佩服这些姐姐们，两年里她们从窈窕淑女锻炼成健壮的农民，扛起了半边天。我能够应付最初的农业劳动全靠她们的帮助。农活比放牧累，但是一帮人一起干活，说说笑笑，还是热闹得多。

知青除了参加劳动，也积极为改变地区的落后面貌出谋划策。雁北干旱，盐碱随着水分的蒸发升到地表，影响收成。看到村边流淌千年的桑干河水，知青帮助大队筹划建造高灌站，引河水浇灌农田。知青多次跑大同到雁北专区联系求助，把变压器、电线等器材托运到东榆林火车站，再肩挑手抬搬回罗庄。他们买水泥电线杆，架电线，把电引过桑干河，终于让罗庄在1971年秋季通了电。我在罗庄时也到高灌站劳动过，领工的是知青杨百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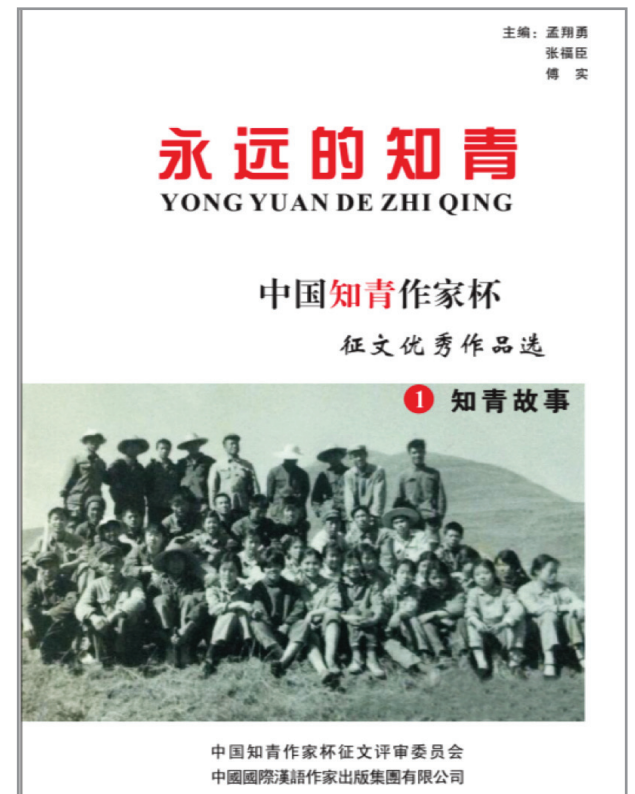
半个世纪过去了，知青帮助策划和参与修建的高灌站还在浇灌着罗庄的田地，有效地压制了盐碱，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让罗庄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山阴县目前划归朔州地区，罗庄的高灌站目前是朔州最重要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列入国家的末级渠系水利工程，里面有知青们的功劳。

只靠农业生产不能让农民摆脱贫困，村里派出民工参加国家的基建项目以增加集体收入。我曾经跟着民工大队去修公路，那也是一段特别的经历。

大队承包了一段新修公路的碎石工程，国家支付民工每人每天一角一分。虽然支付极低，但仍然是村里一笔额外的现金收入。我戴上草帽，拿个大榔头就跟着大伙儿出发了。步行几里地到达工地，坐在地上把拳头大的石头敲碎，达到铺路的标准。

这是个出力气就行的活儿。我快快抡锤击石，手臂震得发麻，石头一个个被敲碎了。旁边的知青压低嗓音对我说：“慢点儿干。”我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她，她告诉我：“干完了就没有钱了。”我扫看周围的村民，都是不慌不忙地聊着天，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慢慢地敲碎。我立刻感到农区和牧区人们心态的不同，理解了为什么说蒙人没有汉人精明。

在锡林格勒大草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烟的稀少让蒙古牧民之间无私的互助成为了必然。畜牧业带来的收入让他们没有对基本生活的担忧。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心胸开阔，自由奔放。而在雁北贫瘠的土地上，经过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村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对于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挣到8分钱的村子，一天有一角一分的民工支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路修完了，这个财源就断了。存在决定意识，生存的需求增进了农民的“智慧”。如果把计时支付改成计件包



工，公路的修建可能会快很多。

我在村里参加农业劳动，和老乡打交道的事全由校友姐姐们代劳，所以罗庄村民对我来说始终是个模糊的整体，没有哪一个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老乡那里，我的名字始终是“董盈的妹子”。他们对我的记忆，停留在1970年夏天我出现在罗庄时对他们的视觉冲击。他们总忘不了我黧黑的脸，身上的蒙古袍和那双放在堂屋地上、每个人都要试穿一下的蒙古马靴。我这个“外星人”生活在罗庄，一直得到乡亲们更多的包容。

在罗庄最轻松愉快的时候是晚饭后和同屋的张祖和、储立新走出村子，坐在地头田埂上乘凉。骄阳退去，塞外吹来的风带来丝丝清爽。面前是漆黑寂静的原野，萤火虫的光亮星星点点，时明时灭。脚下水渠的细流静静滑过，倾听着我们的高谈阔论和窃窃私语。我们诉说着插队的经历和各地的世态民俗。她们最感兴趣的是我的内蒙经历。当我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塞外风情和草原上的奇闻趣事时，感觉到她们惊异的眼神，听到她们哈哈的笑声，心里自有几分得意。锡盟草原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浪漫的、荒蛮的。一切艰苦过去，脑海里留下的是探索者奇特美好的记忆。

我们聊过去，聊现在，却不谈将来。将来永远是隐秘在苍茫之中的未知。就像桑干河底的一个沙粒，是随波涛流入永定河，再奔向大海，还是在什么地方沉积下来，成就千年后的岩石，不得而知，它只享受今天河水的冲刷洗涤。一天劳动过后，一群情窦初开的北京大姑娘聚在雁北的田野上分享人生的经验，探索生命的奥秘，苦累都抛在了脑后，我在罗庄的生活并不寂寞。

——待续——